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第十届贸发大会

贸易和发展高级别圆桌会议：
二十一世纪的方向

将贸易政策作为发展政策：
以五十年的经验为基础



Distr.
GENERAL

TD(X)/RT.1/2
3 Dec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联合国第十届贸发大会

贸易和发展高级别圆桌会议：

二十一世纪的方向

2000年2月12日，曼谷

将贸易政策作为发展政策：

以五十年的经验为基础 *

本文作者为

联合王国苏塞克斯大学

L. 阿兰·温特斯

* 本文表达的观点系作者的看法，并不一定反映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见解。

内 容 提 要

尽管争论了五十年，但国际贸易仍然是发展政策的主要领域之一。我扼要阐述一下开放成为普遍选用的政策立场的过程，并对新的一千年中剩下的若干贸易问题作些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进口替代作为一条发展道路自然而然地由知识和实际制订政策环境产生出来。大政府显然奏效（行政官僚们懂得如何计划），人们将制造业与发展 and 所需要的规划划等号，并以节省所有其他进口品的方式保证将外汇留给必需进口的资本设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点无法再自圆其说了。经济理论说明，对于大部分市场职能失效的情况来说，贸易政策并非是一种恰当的对应办法，开放型经济在效绩方面超过了封闭型经济，进口替代式的贸易体制已证明充满众多、任意专断和高代价的扭曲。此外，一旦认识到政治上被俘使得难以作出有效和不偏不倚的干预，政策建议即朝着有利于市场和不干预立场转变。然而，这些立场尚未完全主导争论，因为如同传统的保护主义情绪一样，这些政策引发了对公平的切实关切，因为我们尚未充分了解开放是如何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

就未来而言，我认为开放和无歧视应当成为我们的口号。开放不仅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有证据为证），而且简单开放的贸易机制有助于良好的政府管理。它减少随意性政策的机会。因而也会减少发生腐败和专横行为的机会，而且为保存熟练劳动力应付教育、高效行政管理等许多其他挑战提供了路子。我的看法是，国家应当大力欢迎生机勃勃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应有适当的过渡期，贸易政策应当解决，落后的海关手续、基础设施和关税等壁垒问题，而且自由化从性质上说应当是多边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应当明确地通过再分配解决公平问题。

七十年代开放式贸易政策居主导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有衡量尺度，它说明进口替代条件下的贸易机制是站不住脚的。目前无法衡量贸易体制并作出归纳的症结就在于很难肯定地证明开放对于经济增长有好处。在今后的十年中，贸发会议如能设计和制订出对贸易体制的有效衡量标准，那将是一项巨大的贡献，对消除批评者们的抱怨游刃有余“一个能制定衡量尺度的贸发会议才符合要求！”

目 录

	<u>页 次</u>
内容提要.....	iii
导 言.....	1
一、回 顾.....	2
A. 迄今的经历：政策.....	3
B. 历史教训：政策的制定.....	9
二、瞻 望.....	11
三、贸发会议应汲取的教训：政策的制定.....	18
参考书目.....	21

将贸易政策作为发展政策： 以五十年的经验为基础

L. 阿兰·温特斯*

导 言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仍然是政策争论的主要领域之一。面对竞争的凛冽寒风，有的人认为保护是发展初期阶段的一个根本内容，有的人则认为保护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而不是解决了问题。这一争论已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尽管当前的思潮比以往更接近于理论光谱的自由学派一端，但争执远未终结。

应贸发会议秘书长之邀，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从个人角度扼要回顾一下自1950年以来有关贸易政策的思想轨迹，审视一下各种观点的演变过程以及贸发会议和其他类似组织今后十年的议程。本文简单扼要，完全是个人看法，无意面面俱到。我所强调的是更加开放的政策在政策建议中取代进口替代政策进而居主导地位的方式，并主张开放和无歧视仍应是我们今后的口号。然而，我承认，历经五十年研究之后，支持这一观点的客观经验证据并不象人们希望的那样有力。我所主张的开放并非只基于经济效率和增长，而且还基于简单开放的贸易体制为发展中国家减少政府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手段的信念；它们减少了随意性政策的机会，因而减少了腐败和专断行为的机会，为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留住有技能的人才、应付发展所遇到的教育、有效行政管理、企业家能力和研究等挑战提供了一条途径。

我认为：有衡量标准是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占支配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七十年代收集的资料和对资料所做的很好的介绍工作，说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条件下的贸易机制是危险的，站不住脚的。我还认为，我们无法对贸易体制作

* 本人感谢 J. Michael Finger 和 Adrian Wood 对本文提纲发表的意见，并感谢第十届贸发大会圆桌会议的同事们对本文以前的草稿发表的意见。假如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本文无疑会更好。我还感谢 Beartice Harrison 给予的后勤方面的帮助。

出衡量和总结恰恰是我们无法有把握地证明开放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症结所在。在今后的十年中，贸发会议如能设计和制订出可有效衡量贸易体制的标准，那将是一项巨大的贡献，对消除批评者们的抱怨游刃有余：“一个能够制定衡量尺度的贸发会议才符合要求！”

一、回 顾

在本节中，我将对战后有关贸易政策的思想变迁史作程式化叙述，并在表 1 中作了归纳，目的在于找出围绕作为发展政策的贸易政策思潮和这些思潮背后的理论和经验因素。我承认，现实生活远比我所描述的要复杂和难以理出头绪，但我仍然力求做到：第一、简洁；第二、突出我所认为的事物发展主要线索。叙述政策思想的历史，主要困难是如何避免事后对各种思潮作自我辩解。经济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人们总能找到政策观点变化的思想先兆，但这并没有回答这种先兆是否具有影响力的问题，如果有，为什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会成为各种备选政策的首选。因此，我请读者不要用一种过于简单的因果推理方式对待历史。在本节结尾处，我还对铸成重大政策建议变化的其他因素提出了几点看法。

在本文中，我通篇只着重论述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贸易政策。我不否认其他国家（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对增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主要因素。尽管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一种大致相同的贸易环境，但它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经历。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特定的国家因素。一旦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经济规模都比较小，简单的经济理论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国家本身的贸易政策支配全球因素。¹

¹ 在世界银行，我发明了一个缩略语：做什么得什么，以提醒人们注意所传达的这一信息。

A. 迄今的经历：政策²

表 1 或许有些主观臆断，对宏观政策理论和以资源分配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作了区分。前者属于大政方针问题（例如哪些因素推动发展），而且明显地论述的是整个经济。后者既包括宏观经济问题也包括微观经济问题。说它宏观，是指它吸收了全面均衡分析的基本见解。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制订过程作出的一项独特贡献，并且是贸易政策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比较优势论属于一般平衡概念。然而，资源分配经济学也包含微观问题（例如最佳政策选择），而且是衡量保护及其影响的基础，它为贸易政策思想的重大演进打下了基础，对此我将在下面加以论证。

表 1

战后作为发展政策的贸易政策思想简史

年 代	宏观政策	资源分配
五十年代	进口替代 商品悲观论与工业化； 对新生经济的保护； 特殊和差别待遇； 区域主义	贸易福利经济学 次佳做法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促进出口	总的扭曲理论 幼稚工业争论 保护的代价 有效保护
八十年代	面向外部 理顺价格； 合称谬误； 调整的代价	保护政治经济学 谋取租金
九十年代	内源增长 理论与实证 政府管理 经济地理学	贸易与技术 贫困 / 收入分配

² 本节吸收了 Anne Krueger's (1997) 关于大体上同一主题的一篇出色论文的内容，我向感兴趣的读者强烈推荐这篇论文。最近关于同一素材的论述包括 Rodrik (1992)、Nayyar (1997) 和 Bruton (1998)。

最初有 Smith（亚当·斯密）和 Ricardo（大卫·李嘉图）；到了五十年代，尽管二人还有一些出色的信徒（例如 Viver（万伊纳）和 Haberler（哈伯勒）），但两人的影响已黯然失色。由于若干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经济学家们相信，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国际贸易严加管理。在战时的一些经济体和在俄罗斯，政府干预的明显成功赋予了国家管理以合法地位。发展与工业化被等同起来，工业化被视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想赢得任何成功的机会就必须同时推动范围广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而这需要相当多的协调。再说，工业化的关键是投资，由于投资产品必须从工业化国家进口，因而保存外汇用于进口极为重要。初级商品出口未被视为赚取外汇的可靠长期来源，因为它们的需求前景有限，而且贸易条件无情下跌。

这些看法渗透了一种条理相当清晰的政策立场，即进口替代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个立场认识问题，地方工业应得到大力保护，要求《关贸总协定》规定特殊和有区别的待遇也就顺理成章了。发展中国家既需要不受《关贸总协定》的自由化规定的约束，又需要增加进入工业市场机会。因而区域贸易安排就成了又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因为它们通过扩大进口替代品市场的规模减少了工业化的成本（Cooper（库珀）和 Massell（马塞尔），（1965））。

该政策也许存在内在条理，但是错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政府力图对经济实行微观管理，进口替代机制变得越来越具随意性并受到扭曲。此外，进口替代显然未能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就业和脱贫工作，而且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也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功。另外，到了七十年代初，以促进贸易而不是限制贸易的为基础的另一种战略随着四小虎（即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国的台湾省、大韩民国、香港（中国）和新加坡）取得惊人的成就而显示了良好的前景。后面我将简单论述一下这些经济体取得成功的原因，它们的经验起码表明，不同时搞进口替代照样可以实现增长和工业化。³

³ Carlota Perez 在为贸发会议圆桌会议撰写的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中说，进口替代理论还未失败到不合适的地步。当五十、六十年代流行的大规模生产技术迅速发展时，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乐于将这些技术出口给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商。然而，随着后来十年这些技术的成熟，通过要素成本和全球寻找供应商而谋求效率的做法将促进出口变成一种成功的范例。有意思的是，她怀疑本世纪末的信息技术是否会给进口替代带来机

Balassa（贝拉萨）（1981）论证的开放型新兴工业经济体远比封闭式的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经济体更好地承受了石油冲击理论是对进口替代论的又一打击（尽管晚了些）。这的确是一大意外，因为以往的进口替代理论宣称能够使世界经济免受一些过度冲击。开放型经济显然确实面临了更大的冲击，它们明显地更灵活，比经受冲击较小的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经济体更能承受冲击，复苏得更好。

用事实抨击进口替代论是有影响力的，但它依靠的是理论抨击，而且理论抨击还是它的补充。五十年代通过对资源分配问题进行的研究对贸易和发展理论作出关键贡献的并不是国际贸易福利分析方面的进展（因为这些分析只是大体上加强了贸易在静止意义上是可取的陈旧观点）而是次佳理论的问世（Lipsey（利普西）和 Lancaster（兰开斯特），（1956）。它以自由贸易学派本身的新古典手法为进口替代学派的观点作掩护，证明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无法保证贸易自由化就是上策。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政策选择的次佳理论已逐渐完善成为一种总的扭曲理论（例如，Cordert（科登），1957 和 Bhagwati（巴格瓦蒂）和 Ramaswami（拉瓦斯瓦米），1963 年的观点），它还导致在政策排序中几乎总是将贸易政策列为上策之一。

从实际角度看，Robert Baldwin（罗伯特·鲍德温）（1969）对幼稚工业论的剖析也许是这类文献中水平最高的作品，这篇论文几乎未给保护幼稚工业留下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此外，人们也认识到了随便地将次佳论理论化的危险（如 Harry Johnson（亨利·约翰逊）（1970）明智的“健康警告”，他指出采用次佳经济学理论需要有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不需要三流或四流经济学家作一般的补充。

六十年代在衡量标准方面取得的进展更为重要。有效保护理论（尽管理论上不够典雅）提供了一种实用的衡量尺度，Bela Balassa（贝拉·巴拉萨）和 Ian Little（伊恩·利特尔）等先驱理论家证实能够找出扭曲并加以量化。它不仅揭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机制混乱不堪，而且还揭示了这种混乱的跨国规律性，结果令人震惊。这种规律性基本上驳倒了进口替代原则上可以接受、只不过在实践中被不称职的行政人员搞糟了的辩解。

会。她的观点引人注目，但这一观点今后是否有用取决于未得到证实的成功技术革命之间的规律性。而且它也未能说明成为进口替代制度特征的混乱，这些替代制度出现太快，太容易不时发生，以至无法仅用全球变化加以解释。

起初，促进出口被认为是新兴工业经济体的战略，它与进口代替形成鲜明的反差。然而，任何国家的净出口刺激因素都没有象进口替代国家的抵制进口扭曲那样大，这一点不久就显示出来了。有关是因为出口刺激因素抵消了重要的进口限制、还是因为政策立场总的来说不是那么具干涉性的激烈争论发生了，而且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比如，目前对东亚国家经验的解释仍有不同的看法。

两个因素导致了八十年代关于规范争论的天平由（整个八十年代）主张利用促进出口手段学派一端朝不干涉学派一端倾斜，这正是我在表 1 中所指的面向外部理论。首先，工业化国家的舆论出现了，由政府行动转向由市场运作的大转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少是第一次，这在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政策中至少起先不象其他方面那样明显（八十年代，自愿出口限制数量增加、多纤维安排限制更严和反倾销行动增加）但并没有妨碍工业化国家在提供发展政策建议时将这种意见用于贸易政策。其次，Krueger（克鲁格）（1974）认为，有效地执行政策很难，而谋求租金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远超过因资源分配不当而造成的传统损失。克鲁格的理论是主张用关税而不是配额和其他管制措施的理论，但不久人们便意识到所有政策某种程度上都会遇到这些困难，即使是制定政策过程也不例外。干预的复杂性和范围的扩大可能直接导致执行效率成本增加，使政策制定者成为特殊利益的俘虏的可能性增加⁴，而且造成直接用于非生产性活动资源的浪费增加。因此，除非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做法应当相反，否则简单、透明和可预见的政策似为上策。

八十年代世界银行的出版物和建议清楚地阐明了这一转变，世界银行是这一简单、高明手法的最有力的提倡者之一。世界银行并未对这一观点进行基本研究，但在填补空白、提供衡量尺度及考虑如何实际应用方面表现突出。衡量尺度再次成为关键，在这方面世界银行在对记录非关税壁垒系统和对非关税壁垒进行分类的开拓性工作中得到了贸发会议无法估量的帮助。

贸易自由化是世界银行（最终将包括货币基金）许多政策模型的特征，自 1987 年前后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扭曲已大幅度减少。但抗议也不少。已经表露出来的忧虑主要有开放边界将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发展制造业、世界市场不能同时

⁴ 成为俘虏是管理人员 / 政策制定者逐渐认同了他们本应管制的部门，因而开始对这些部门的直接利益给予不应有的过分照顾的过程。

吸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与预期的收益相比调整代价（既包括政治又包括经济）太大等。

第一种担忧只是旧的进口替代论的翻版，虽然自由化可导致某些受保护的制造业受损失，但说它削弱工业化证据并不充分，更不要说有害地削弱工业化了。第二种明显是对一些初级商品的忧虑，但作为一般主张，它忽略了实行自由化的国家既是市场也是供应者这一事实。如果若干类似的国家一起实行自由化，尽管有可能出现不利的贸易条件泛滥，但它们不大可能抵消自由化的全面好处。调整代价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但谁也不能无限期地推迟变革。如果最终目标完全可信，在自由化的时间安排和顺序选择方面确实存在着细小的差别，但损害信任的常常是拖延，有时选错转变道路会在很长时期内使扭曲更加恶化。

面向外部论在政策辩论中所取得的“胜利”甚至对其本身的鼓吹者也是挑战。肤浅的经验论支持这一立场，但纯理论是不可知的。对进口替代的理论质疑基本上是静态的，而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动态的。需要证实的是“开放导致增长”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也许处处灵验的有效的药方，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它管用。即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研究开放的相对静态好处，而且还要分析实现静态收益的途径以及（如果有的话）真正的动态收益。⁵

理论工作并未起到多少帮助作用。新的“内源增长”理论强调的是学习、知识和人力资本，它为比较优势开辟了新领域(学习相对于生产)和新途径，国际分工可通过取消多余的研究工作中产生规模经济。但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不堪一击，还远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应用。这些结果时常表明，有些国家可能成为国际贸易的输家，但由于难以靠经验确定一个国家何时可能落入最差一类，因而这种

⁵ 经济学家通常从简单的收入角度考虑增长，而增长的其他方面（更不要说发展了）显然也很重要。幸运的是，各个方面有一种非常积极的相互联系。除此之外，凡它们相冲突时，保持平衡的困难并不在于对确定不同因素之间的技术关系没有把握，而更多地在于给与多大相对重视上存在分歧。

分析对于实际制定政策并无多大帮助。宣布贸易政策应当促进学习和采用技术是一回事，而设计一种能实现这种目标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⁶

证明开放对增长确有好处的实验工作看来更有希望。起初(八十年代末)，人们对剖面经济计量学能否给人以必要的深刻见解还有些疑惑，但增长经验论学派的新观点将这一疑虑一扫而光。尽管从技术上讲“内源增长”理论既复杂而且又难以把握，但主导其实验的主要是简单的剖面回归方法。⁷ 九十年代初，这些学派(也许最著名的是 Sachs(萨克斯)和 Warner(沃纳)(1995))认为，从表面看，开放有力地促进了增长。对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向来是有点争议的，尤其是对开放的界定，但在政策辩论中它们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最近 Rodriguez (罗德里格斯)和 Rodrik(罗德里克)(1999)把对这一研究流派一些疑问正式提了出来，似乎又回到了老的不可知论。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开放或贸易自由化对增长有害，但两者对增长有利之说也难完全有把握。

近来关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例如 Krugman(克鲁格曼)(1995))与内源增长理论文献的某些不确定性类似。前者聚集外部效应取代了后者知识外部效应，而研究结果再次表明，在某些界限内可能出现累积过程，一些国家可能在贸易中受损。经济地理学理论因涉及的是聚集和激剧增长等现实世界的现象，所以从思辩角度看很具吸引力，但我认为它尚未对贸易政策产生任何实际指导作用。原因之一就是其研究结果离不开贸易成本的一般化概念，而对目前尚不能令人信服地对贸易成本进行衡量。

与此同时，由于对开放是否一向有利于国家的理论质疑的深入，对贸易是否会伤害国家内部一部分人的研究兴趣也恢复了。从理论上讲，人们都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却将它忽略了。重新勾起对这个问题研究兴趣的大部分功劳应归 Wood(伍德)(1994)。

⁶ 我在审评小组中的同事 Deepak Nayyar 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也记述了一种大体相似的历史(Nayyar, 1997 年)，但他视之为是一个有错误的理论的令人遗憾的胜利，而非朝着更好的政策的艰辛奋斗。

⁷ 关于“趋同”文献更为精深，但在贸易政策圈子内，其影响力低于简单的增长模式。

B. 历史教训：政策的制定

历史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巨大实在的教训：封闭和管得太死的经济不会兴旺发达。程度得当的开放，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后果方面，或多或少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似乎是必要的。我认为，历史还帮助我们理解政策思维大思潮的逐渐演变过程——如果我们打算影响今后的政策(并且理解为什么有时我们未能这样做)，这就是一项非做不可的工作。

以上陈述包含了程式化的事实/对世界的认识、实际事实(注意两者通常是有区别的)和分析方面的进展。然而，为了阐明政策过程，我们还需要补充说明为所涉及的各个行动者提供的鼓励。政策的设计和分析不是由冷漠的自动化过程进行的，而是由个人作出的，而他们即便按照最严格的专业标准行事，也会有自己的兴趣和见解。这些兴趣和见解未必会主宰确凿的事实根据，但的确会对研究议程产生影响，而在事实根据无法代为我们作决定的领域，影响决策。

进口替代除了建立在对世界和对发展的一系列错误假设之外，还得到了两类特殊拥护者强而有力的支持。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制造业能够在若干边缘经济体内兴起，如果不通过保护来缓解的话，它们无疑会感到传统制造业恢复供应的巨大压力。这些国家中的工业精英因其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将进口替代弄得神乎其神。其次、更有争议的是，计划恰恰是官方经济学家和行政官僚们所熟悉的，他们对质疑常理毫无兴趣。⁸

学院派经济学家也没有提出什么质疑。在 Krueger(克鲁格)提出的若干原因中，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未能使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例如很难否定对积极动态外在性提供暂时干预(例如，对初生工业给与帮助)。但要做到有用，就需要有检测和量化外在性的工具，并且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婴儿将会健康地长大并将偿付养育费，哪些需要一出生就应予以窒息。同样，贸易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要说明为什么基于比较优势的无节制的贸易无法保证是最佳选择。尽管从思辩角度看这并没有错，但这类文章时常为那些企图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否定比较优势的人帮了忙。如果它们的作者能

⁸ Carlota Perez 还提出进口替代恰恰符合工业化国家公司企业的需要——见以上脚注 3。

够更谨慎地指出其论点的限度，划定应用范围，并说明他们的结果在何种操作条件下可能有益就会好得多。

也许不幸的是，学术标准既不鼓励可操作性，也不鼓励在研究结果适用范围上表现出谦逊态度，而强调的却是优雅和一鸣惊人。在这些相对事物中政策具有固有危险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战略贸易政策，它雅典、惊人、令人兴奋，而且最初是有趣的。但从来就没有特别大的应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年之后，其为首的倡导者(例如，Paul Krugman(保罗·克鲁曼)和 Avinash Dixit(阿维纳什·迪克西))不再将它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然而，它却仍充斥于二流杂志的版面和出现在决策者的讨论中。

与可操作性并列的是衡量标准。衡量标准也许是进口替代的关键抗体，而且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经济学这门职业低估与理论(理论家)相对的衡量标准(衡量者)的价值，因此就薄弱了。我认为，了解开放与增长之间纽带联系的主要障碍在于衡量标准——由于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失误，我们无法充分勾划出贸易体制的特征。以上谈到的截面剖析文献的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将开放作为一种两分法的变量对待——你要么开放要么封闭。然而，实际上，虽然可能存在一种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即可将贸易政策视为“封闭的”(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另一种界线，在其以下的政策即可认为是“开放的”(例如中国香港)，但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其中“开放”是依次，甚至是主要的。目前我们尚无法令人满意地找出这种界线或讨论开放的程度。

进口替代观点的一个衍生物就是《关贸总协定》下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区别待遇。一开始还比较微弱，但到五十、六十年代它们就有了自己的动力，其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出口优惠和在进口政策方面免于实行各种纪律是由政治和宣传驱动的，而不是由经济分析驱动的。《关贸总协定》的纪律被其成员国视为是一种代价，放弃这些纪律是收买发展中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和西方经济体系的一条简便廉价的途径。这一动力又因关贸总协定与贸发会议相互较劲而加强，其中后者将偏向发展中国家的程度视为政治上几乎唯一正确的衡量贸易自由化的尺度(见 Finger(芬格)，1991)。这种经历增强了我所认为的两种教训：第一、不能使政策脱离政治，但后者有可能强调和发展前者的毫不重要的方面。第二、衡量标

准至高无上。在这里，正象芬格所认识到的，尽管衡量标准不恰当，但它对辩论的影响是无法否认的。

在政策制定方面有很大的惰性。我已经指出，进口替代对于在职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吸引力，有稽可查，克服这种惰性要花很长时间。最近，在贸易谈判中也可以察觉到类似的情况。为处理东京回合而组建起来的庞大贸易官僚机构需要在八十年代初找些事情作。它们力促展开进一步的贸易谈判并且促使贸易成为例如发展政策这种领域中的一个问题。自乌拉圭回合以来，这些官僚机构故伎重演，并且将它们的手伸进区域贸易协定。澳大利亚驻世贸组织大使 Geoff Raby(杰夫·拉比)指出，这种“为闲着的手找活干”是九十年代区域主义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这里面的教训是，如有一个现成的机构执行政策信息，其成功的可能性就极大，而最好为官僚机构备好有用的事去作。

二、瞻 望

我还愿考虑一下贸易和贸易政策的未来。在本节中，我提出在今后十年中有可能十分重要的五个问题并粗线条地试着提出一些答案。最后谈一谈所有这一切对贸发会议意味着什么。

五个关键的政策问题

(一)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能否找出可加速发展的非中性干预？我们能否防止被俘？

这个问题的措辞是经过仔细琢磨的：并不是“是否存在”干预，而是我们能否“找出”干预。毫无疑问，一次性政策干预很有好处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保护可能为学习或培训提供了机会，或者产生了贸易条件方面的收益，或者帮助贫困家庭学会了新的技能。但出于三类原因，这些机会大多非我们所能掌握。

首先，我们一般并不掌握可有效找出机会所需要的信息。看出某件事错了通常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说出它为什么错了，并且能证明贸易和有关的干预能解决问题。例如，如果劳动力的培训费用使未来的制造企业处于不利地位，保护能否提高它们培训工人的动力，还是会因为增加了进入这一部门的新的企业的数目且吸

引劳动力脱离主干公司而减少了这种动力？农业保护可提高价格，但其效果如果全部资本化为土地价格和租金，就不会增加农业劳力或小农场主的收益。此外，重要的是应认识到政策是相对的。必须弄清楚的不仅是是否有人由于干预而受益，而且还必须弄清他们的受益是否大于在另一种政策下的受益以及他们的受益是否超过受损者的损失。保护汽车制造业可能对这一行业中的企业和工人有利，但消费者和其他用户(通常为其他企业)却因价格升高而受损，其他生产商也因技术工人的工资提高而受损。汽车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可能对学习和对非技术工人产生出某些外溢效果，但如果他们留在未受扭曲的小型制造服务活动领域，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外溢作用。

其次、干预转变为行为和后果的过程常常取决于非常微妙的参数，而这些并不容易观察到，对于受到严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更是如此。这立即造成政策制定过程要听凭利益集团的摆布。导致被俘的不仅是公然的不诚实，而且还是一种阴险的交换情报和创立规范过程。除此之外，如我在上面指出的(见脚注 4)，被俘不仅有可能发生在部门行业，而且也有可能发生在制定政策的行政官僚身上。近年来值得欢迎的是关心统治的实际兴趣和学术兴趣骤然浓厚起来，当前的舆论将统治失灵视为发展挑战的核心问题。对于鼓励廉政来说经得起检验的、简单和非酌情处理的政策远比相反的政策要好，因为它们给贪贿造成的机会要少，对监督者的诱惑也少。除此之外，扭曲少的政策通常比扭曲多的政策给贪污腐化带来的利益要少。从这些角度看，低统一关税的好处巨大，远超过精细制定的累进高关税。

第三、干预还产生了系统方面的问题。如作出足够的努力有可能克服干预性贸易政策中的信息和管理问题，但代价很高。另外，通过传递愿意干预的信号，实际上是在鼓励他人提出干预请求：成立公共和私人机构审查贸易干预的这一行为本身客观上长期维持了干预请求，吸收了劳动力而这些劳力本来在其他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使用。另外，机构产生惰性，即便是曾一度有理由解决的条件发生改变之后，游戏照旧继续——例如，考虑一下欧洲的农业官僚体制就清楚了。换言之，有效干预即便有可能(对此我表示怀疑)，代价也可能极高而划不来。

对贸易政策的这些责难也同样适用于政府的某些其他领域，例如工业政策，但它们并不是“反政府”的例子。政府有数不清的任务——健康、教育、基础设施、

法律结构、海关管理等。这些其他任务如此重要也是政府为什么应当避免贸易干预的另外一个理由。

即便是象本文这样简短的陈述，在讨论贸易政策和发展时也不能不提到东亚。此处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大韩民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它们无疑采取了干预，尽管如以上指出的，总的说来在进出口之间是较为中性的干预，而且它们显然发展十分迅速。⁹ 它们的政策立场有其独特的特征。例如，对出口的注重为公司企业提供纪律、为政策提供尺度并限制了经济其他领域过分扭曲；制定政策的环境还使得能够对政策错误作出迅速纠正。这些国家在其他政策领域，例如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也有极为突出的表现。令人感兴趣的是 Lee(1995)认为贸易干预妨碍韩国的生产力增长(而税干预却起到帮助作用)。我无法肯定我们已真正透彻了解东亚经验，但我的确认为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这是一种亚洲经验而不是一种全球经验。

不时有人称鼓吹开放的人们提倡的是分配效率但却以牺牲技术效率为代价(例如，Nayyar, 1997)。开放能直接增强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效率的论点缺乏特别有力的证据。然而，就允许有效率的公司企业扩大而言，其间接作用是很大的，而不鼓励公司企业人员调整的政策(例如，为在职者量体裁衣定出的保护措施)将会减慢技术进步的速度(Roberta and Tybout, 1996)。此外，Bigsten 和其他人(1998)显示，在低收入的非洲，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因开放而得到加强。

最后，必须弄清最佳的贸易干预是否因国家而异。如果谁相信发展等同于制造，谁就可能要求通过比较优势脱颖而出，因为比较优势会导致一些国家脱离这一部门。然而，我不相信这种看法。小的孤立经济体或那些自然资源丰富或内部交易成本高的经济体，例如非洲国家，不可能建立重要的制造业基础；然而，一些分部门仍然会为了地方市场和有可能为了特定的出口市场而向它们开放。此外，象样的生活水准不一定靠制造业，例如新西兰和智利就是例子；没有证据显示一个被娇宠的制造业部门可以改善生活水准。

另一思想流派建议对发展阶段作出区别，它主张最贫穷的国家需要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立场。这就把我们引导到第二个问题上了。

⁹ 香港(中国)和新加坡一开始就比较开放，正如第二波起飞的经济体。

(二) 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是否有先决条件？是否有必不可少的配套政策？

我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答复是，虽然某些条件明显有帮助，但不存在绝对的先决条件。很明显，贸易方面的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为利用开放边界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若尚不存在，我认为发展这种基础设施是一种必要的配套条件。但即便是基础设施不存在，自由化仍有可能开创某些机会，而延迟自由化等于放弃这些机会。只有基础设施结构方面的漏洞带有严重的偏袒性以至贸易发展有违长期比较优势(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时，或缓慢的开端将不可挽回地损害自由化的政治条件时，我才建议等待。

大多数的拖延所产生的问题是，它们为后来的政策改革投下阴影，因而妨碍而不是有助于朝着一整套恰当的配套政策方向演化。如果要等到贸易改革一切都“就绪”，就要无限期等下去。一旦可信地确定了最终目的地(通过政治行动，可能的话，得到世贸组织规定或对布雷顿森林体制承诺的协助)，我个人的看法是，过渡阶段可能相当长。这种循序渐进使得能够进行各种法律和体制改革，从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收获自由化的利益，并缓和自由化的任何周期性障碍。然而，关键的条件是必须对最终的自由化很有把握。有趣的是，一些贸易改革最初遇到很大阻力并且只得靠长过渡期才能够谈判下去，而调整一旦开始，实际上却加速了——例如肯尼迪回合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自由贸易。大概是，目标一旦明确，经济角色即选择与其靠拢。

在进口替代期之后出现了东亚外向型政策的成功，并伴随着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巨大步伐，这些是否属于贸易自由化的先决条件或配套条件？在具有强有力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东亚，这一整套政策效果很好，但它并不能证明对其他国家同样适用。

教育对于发展来说极为关键，但相对贸易政策而言十分独立，因此并不真正属于本讨论的范围。然而，要使贸易自由化取得成功，是否必须在此之前有一段进口替代时期，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几乎所有国家或多或少地都从已经供应国内市场的工业中发展了出口工业。Amsden (即将出版) 十分雄辩地指出，在工业经济体和那些构成它的“其余部分”的经济体中 (广义上说为一批基础牢固的中等收入经济国家)，只有瑞士和香港 (中国) 采用了自由贸易作为一种追赶战略。她列举了许多出口是由国内工业发展出来的例子。

在解决这一进退两难的问题上历史曾对我们比较刻薄，因为五十、六十年代进口替代一度或多或少地成为普遍的信条。因此，正如由它产生出成功的经验一样，其中也有不成功的例子。此外，实际问题并不在于出口是否由国内销售发展出来——出口几乎一向如此，因为极少有企业家在新兴工业部门纯粹经营出口业务——而真正的问题是出口是否产生于受到高度保护的国内销售。Amsden 提出的观点是，工业化战略成功与否的区别就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从受保护的国内工业中发掘出口。¹⁰ 我认为，低水平保护可有助于这一进程。我还认为，一个开放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出现很低的实际汇率，从而产生为国内市场服务的制造业，而如果相对优势起支配作用，就能够从国内市场发展出口。而且，建立一种没有相对优势的制造部门不是一项明显有用的战略。它造成持续要求保护的游说团体并且在实行自由化时要经过重大的改革。我在上面提到工业化并不等同于发展，因此我对在自由化之前增强这一个部门并不十分赞成。

在非常贫穷的国家，贸易税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制定替代措施，其中包括消费税是一种配套政策，但我不主张将自由化推迟到颁布这些备选措施之后。如果所有保护机构将非关税壁垒转变为关税，统一税率(最理想的是保持在一个单一水平上)并取消例外，就能够对几乎所有保护机构进行改革而不损失收入。

(三) 无歧视是否已成为过去？

我对此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单方面的优惠——特别为贸发会议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所钟爱——总的来说并不成功(Wang and Winters, 1997)。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幅度很小，因为工业国家的关税比较低。在幅度并不小时，优惠受到数量(正式或非正式)或原产地规则方面的限制。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时常根本没有优惠——例如，美国的普惠制将成衣排除在外。在优惠幅度非常之大的少数例子中，又缺乏投资和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们无保证。两眼盯着优惠使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者学会了选择短期准租金做法而不是着眼于长期需要，并且使他们受到例如劳工标准这样的不相关的问题的压力。

¹⁰ 与此相关的是 Roberts and Tybout (1996) 显示，出口激增一般大量依赖现有的国内公司企业兴办出口业务。

我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安排也同样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存在着南北安排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例子，例如葡萄牙和我想还有墨西哥，但这些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加入毗邻和更富的邻国行列的例子。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区域贸易安排看来有可能分散制订恰当的放眼全球市场的发展政策的努力；这种安排有可能造成贸易转移而不是贸易增加的效果；它们不大可能为经济增长起什么作用(见 Winters, 1997; Vamvakidis, 1998)。区域贸易安排可成为通往不歧视贸易自由化的一条道路，例如用为较一般性的改革建立同盟的办法。但研究表明，这类安排也有可能阻挠朝着这一方向发展(Winters, 1999c)。

眼下并无世界分裂成为若干个贸易集团的危险，但这种危险也并非完全不存在。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极为有害，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认同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从贸易转移和扭曲其生产模式以适应整个集团需要来说，这可能造成十分高的代价。这样做还会付出政治代价，因为依赖于某个单独的集团会削弱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McLaren, 1997)。

(四) 对脆弱群体怎么办？

贸易政策带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几乎任何变化都注定会造成赢家和输家。我们忘记了现有的政策已影响到目前的收入分配，而只是从谁受到政策的伤害的角度来讨论改革。如果政策变化突然损害了某些家庭，毫无疑问会引起人们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关切，但重要的是要问一下现状对于长期来说是否是正确的基准点。进口替代典型地有利于城市资本所有者，城市工人和行政官僚，作出一些调整，使之有利于其他群体也是很应该的。

在现实世界中，贸易改革的再分配后果可能非常微妙和令人惊讶，这取决于极为具体的当地条件。Winters (1999a, 1999b) 详细讨论了与贸易和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因素，并对某些实地研究作了描述，该项目得到联合王国国际发展署的支持。它表明，印度和非洲国家中贸易和相关的改革有能力通过使穷人以更好的条件出售他们的产品或劳动力来缓解贫困。然而，它也表明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崩溃或消失，因而造成贫困方面的严重后果。有这样一个例子，当国家销售管理委员会(它具有交叉补贴农村征收的权力)为私人贸易公司所取代时赞比亚边远地区的农民便丧失了出售他们的玉米的能力。这个例子表明，改革应伴之以认真的监

督和补救行动，以确保当出现贸易自由化时，市场能够以竞争方式有效地发挥职能。

贸易自由化加重贫困的有害效果有时被作为不能进行改革的理由提出。我不能同意这一点，但可能应当对时机予以考虑——举例说不能在衰退之中让一个劳力密集部门自由化。首先，正如我在上面所暗示的，人们需要仔仔细细地想一想改革对于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净效果。只找出一些输家——即便是贫困的输家也不足以对一项政策大加鞭挞。由于贸易改革通常刺激增长，自由化一般有助于同贫困作斗争。

正确的态度是对补偿政策作出思考。尤其在美国，以贸易调整帮助的形式对具体的补偿作了尝试，效果是好坏参半。可能它不象一般的扶贫补偿措施那样有效，例如，公共工程和以粮食换上学方案。这些方案直接对付贫困并且避免了需查明问题是否由贸易改革造成的这种辛苦工作。而且它们一般来说不特别扭曲，因为它们只影响那些实际上别无其他选择的人。扶贫方案对于减轻贫困来说用处极大，因此在贫困影响可能构成问题的地方，当然属于贸易自由化的配套措施。然而，它们不适宜解决超出收入分配范围的有害冲击。在这方面需要的是总的失业保险和培训方案。

没有必要佯装无人因贸易改革而受到伤害。但另一方面，显然也绝不能让改革方案成为少数受损者的人质。在我看来，正确的方法在于总的使调整平缓发展的政策，如果普遍认为贸易改革将引发特殊的困难问题，则有可能通过特定的临时贸易改革方案来加以补充。

(五) 贸易政策是否是发展的关键？

贸易政策仍将是一个实际问题。毫无疑问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发展政策问题，例如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管理，但错误的贸易政策可能妨碍发展努力。一种极端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可能使其他政策进一步脱轨(Krueger, 1999)，如果贸易政策任意专断而又具有干预性质，它就会毒害整个政府与工商企业界之间的关系。¹¹

¹¹ 即便是有关各方吸毒成瘾而未察觉。

为了使这一答案更精确，我们有强烈的却不很正式的证据证明贸易对于发展很重要。贸易政策对贸易到底起多大作用，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有把握了。从极端例子看，考虑一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等便清楚它确实起作用。而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阶段政策进入“可接受的”范围，这里我认为，我们有点困惑，因为我们无法对贸易体制作充分的衡量。

问题不只在收集 and 归纳官方壁垒方面的资料，而在于抓住微妙的方面，例如关税的征收有多可靠，作出的改变有多频繁，这些变化对于游说有多敏感，得到安全阀似的保护有多容易和扭曲有多大。清晰、可以预见性和没有官方任意处理的情况，可能与关税是 5% 还是 15% 同等重要。

与此相关的是广义上的“贸易政策”，它包括便利贸易的问题，例如海关行政；和支助性服务，例如银行、保险、通讯和运输以及港口效率。它们比关税更难改革，但却随着关税的下降和全球供应链开始主导生产和贸易而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此外，这些问题也正是最近内原增长和经济地理学方面的工作与工业设址和工业起飞挂勾的问题。以这种方法解释，贸易政策又回到了舞台中央。

我得出的结论是贸易政策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其传统上所关心的问题并不足以保证发展，但将它们理顺是朝着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可表明对另一广大的战线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只有当传统的贸易手段宽松到允许有意义的贸易量和足够的竞争，从而保证低贸易成本可使消费者受益的程度，改革贸易基础设施的努力才有意义。

三、贸发会议应汲取的教训：政策的制定

最后，我要问所有这一切对于贸发会议及其所从事的贸易活动意味着什么？

本文所传达的主要信息就是衡量标准十分重要。而这正是贸发会议的主要长处——它所拥有的贸易分析和资料系统保存了有关各种贸易壁垒方面的记录——因而我敦促这一领域应当成为今后的着眼点。尚没有任何其他机构显示有能力搜集整理出贸易政策数据。世贸组织拥有手段，但却不能将数据收集与其工作的谈判/

政治方面脱钩，因而使它很难成为分析所有数据的可靠来源。¹² 贸发会议则可通过将其各种资源专供收集、核实和出版贸易政策和贸易数据而在这一辩论中处于核心地位。

与此相关的是，贸发会议应当承担并促进其他机构和研究人员努力搜集有关其他贸易磨擦方面的数据。这些包括例如环境、采购和服务方面的规章制度限制以及我在上述贸易促进领域所提到的成本。贸发会议在上述一些方面也保持了良好成绩记录——例如，有关环境方面的规章制度和世界银行/贸发会议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方案——对额外信息资料的需要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除此之外，在重要的分析工作方面也有很大的余地，比如设计恰当的衡量方法并对这些数据作出分析摘要。

在政策方面，贸发会议也许被认为同情贸易干预的观点。然而，这常常基于的是可能性或者是对其他地方所提出的偏好市场的概括所作的批驳。Krueger's (1997) 呼吁应作到可操作化在这里是关键。我们应当强调需要对政策建议的适用领域加以界定，并且有明确的途径可以查明我们何时超出了界线。诚实地界定范围将会(从各方面)为我们留下许多灰色区域，使我们不知道采用哪种政策恰当，但匆匆忙忙以夸夸其谈方式对这些领域加以“殖民占领”，对于一个国际组织来说既不能给人以启发，最终也不会有用。

与这一界定范围有关的是对理解我们建议的程度能抱多大的诚实态度，国际组织和捐助方——尤其是我的前雇主，世界银行——常常大谈“最佳的做法”。对于象发展这样长期目标来说，这又引起了我们如何知道哪一种做法是最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澄清会受到欢迎。我们谈论的大部分至多只是临时性的。

人们向来担心政策建议如果不够大胆、有信心和全面，就会为决策者留下余地，由他们挑选混合，为他们想做的事找出一番伪科学般的证明理由。当然，作决定的是政治家/决策者；但如果分析家想要避免不被误解误传，我们就需要比以往更加有充分准备地指出实际政策的后果，令人惊讶的相互关联(例如哪些公司企业从这一政策中受益)和错误的前提。这具有与政府冲突的危险；而它们是国际组

¹² 世贸组织本身的数据是可靠的，实际上世贸组织批评贸发会议在这方面的缺点。而问题是获得世贸组织的数据并无保障。

织的“所有者”。然而，如果一视同仁地采用这一方法，大部分对评论它们的内部事务不满的政府仍然会作为使他人事务更明确和更有纪律的代价而加以接受。

参考书目

- Amsden A (forthcoming). *The Rise of the Rest: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utside the North Atlantic Reg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lassa B (1981). The newly-industrializ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oil crisi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17(1): 142–194.
- Baldwin RE (1969). The case against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 295–305.
- Bhagwati JN and Ramaswami VK (1963). Domestic distortions, tariffs and the theory of optimum subsid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2: 44–50.
- Bigsten A *et al.* (1998). Exports and firm-level efficiency in the Afr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mimeo). Oxford, Centre for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 Bruton H (1998). A reconsideration of import substit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2), June: 903–936.
- Cooper CA and Massell BF (1965).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3: 461–76.
- Corden WM (1957). Tariffs, subsidies and the terms of trade. *Economica*, 24: 235–42.
- Finger JM (1991).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GATT. In: de Melo J and Sapir A, eds. *Trade Theory and Economic Refo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3–223.
- Johnson HG (1970). The efficiency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McDougall IA and Snape R, ed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83–103.
- Krueger A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291–303.
- Krueger AO (1990). Asian trade and growth less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0: 108–112.
- Krueger AO (1997).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we lear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1–22.
- Krugman PR (1995).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ee JW (1995).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Kor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W5060.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Lipsey RG and Lancaster K (1956). 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bes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 11–32.
- McLaren J (1997). Size, sunk costs, and Judge Bowker's objection to free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400–20.
- Nayyar D (1997). Themes in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Nayyar D,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2.

- Perez C (2000).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aradigm chang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Round Table at UNCTAD X, Bangkok, February 2000.
- Roberts MJ and Tybout JR (1996).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icro Patterns of Turnover, Productivity and Market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 Rodriguez F and Rodrik D (1999).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evidenc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43.
- Rodrik D (1992). Closing the productivity gap: Does trade liberalisation really help? In: Helleiner G, ed. *Trade Policy, Industri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chs, J and Warner A (1995).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95.
- Vamvakidis A (1998).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versus board liberalization: Which path leads to faster growth? Time-series evidence. IMF Working Paper No. 98/40. Washington DC, IMF..
- Wang ZK and Winters LA (1997). Africa's role in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7 (Supplement 1), June 1998: 1-33.
- Winters LA (1997). Assess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rrangements. In: Burki J, Perry G and Calvo S, eds. *Trade: Towards Open Regionalis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8: 51-68.
- Winters LA (1999a). Trade, trade policy and poverty: a framework for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vide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imeo). Brighton, UK, University of Sussex.
- Winters LA(1999b).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pover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imeo). Brighton, UK, University of Sussex.
- Winters LA (1999c). 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In: Baldwin R, Cohen D, Sapir A, and Venables A,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d A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 -- --